

整理说明

先父徐一士,原名仁钰,字相甫,号蹇斋,生于 1890 年 11 月,卒于 1971 年 11 月。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其祖父徐伟侯道光年间进京赴试后入宛平籍,于丁未年(1847)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并自此结为通家之好。父亲徐致愉 1870 年在京中举后分发山东任知县,举家迁鲁。先父于 1910 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随后经清政府学部考试,授予举人出身(时称学校举人或洋举人,有别于科举举人)。两年后迁居北京,1924 年在北洋政府实业部(后改农商部)矿政司充任科员、主事。1928 年起,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担任编纂员,直到 1955 年退休。在早期任职期间,还曾兼任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补修社、北京国学书院讲师、教授。退休以后,经梅兰芳先生举荐,被北京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先父一生从事历史掌故的研究和著述,他自幼即喜读史书,他的学问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诲,父亲徐致愉对他的成长帮助最大,对他的教育是比较开放的,无论经史子集乃至

小说笔记,都为他讲解,启发他自学,他的三兄徐仁铎精通掌故、骈文,四兄徐凌霄博学多才,都对他有帮助。在高等学堂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精通英语,大大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家庭的政治环境影响尤深,在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的二伯父徐致靖和堂兄徐仁铸、徐仁镜、徐仁録都是直接推动变法的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后罹重罪,“六君子”被诛,徐致靖时任礼部左侍郎,因直接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任要职而列为首犯,未经审讯即被西后判“斩立决”,只因李鸿章闻讯后鼎力营救,才改判“绞监候”,幸免为“七君子”之首,徐仁铸为光绪帝钦典湖南提督学政,也因向其父徐致靖推荐上述五人而被判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忧愤致死,遭到家败人亡之祸。这次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早在先父少年时期就打上深深的烙印,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改革之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方建,京、津、沪等大城市新出报刊有如雨后春笋,先伯徐凌霄与先父开始为几家报纸撰稿,从此均步入了新闻界。1913年,先父迁居北京市,就应《新中国报》聘为编辑,同年就任“报界同知会”编辑主任。他在《新中国报》发表中国近代史料文章后,由于资料翔实,立论精辟,很快在京师史学界引起轰动,众多报刊纷纷约稿,自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先后任《京津时报》、《日知报》、《京报》编辑,兼任《时报》、《国语日报》、《新申报》、《商报》、《四民日报》、《大公

报》通讯,同时受《晨报》、《实报》和期刊《国闻周报》、《逸经》、《大风》、《中和》、《古今》、《文史》、《国艺》、《大众》(分别发行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等聘为特约撰述。他终日伏案奋笔,乐此不疲,几至废寝忘食,笔耕不辍约四十年,在他多年的任公职期间,也未中断。

先父徐一士自1929年7月至1937年7月连续8年在上海《国闻周报》逐期发表署名“凌霄一士”的掌故文章《凌霄一士随笔》,约120余万言,这是由他执笔写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意是要继续写下去,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南迁,北平沦陷于日寇,被迫停止投稿,《国闻周报》不久也停刊。日寇侵占北平后,时隔不久,因发现徐一士过去在香港《大风》杂志发表过反日文章,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他,关押近3个月,期间曾遭拷打。后虽经友人保释出狱,但有相当一段时间停止了写作。过了一些时候,有多家报刊杂志约稿,才逐步写一些有关清史方面的文章。1942年,好友瞿兑之^①约请他为《中和月刊》写稿,徐一士即在《中和月刊》上连载了《近代笔记过眼录》,这一著作可以视为继《凌霄一士随笔》之

^① 瞿兑之先生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家学渊源,与先父是世交,更是文坛挚友,他二人在清史掌故方面的研究,因有家族亲身经历的关系,更为精深。据先父在上海的挚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周黎庵先生为回答我的询问于1991年11月18日寄给我的复信说:“……兑之先生于1945年来沪,据说为荣府西席10年,50年代中以‘蛻园’之名活跃上海文坛。此一时期常相过从。‘文革’开始,因江青照片事件打成反革命集团入狱,判刑颇重。1972年在狱病危保外,不多日即去世。所谓集团,皆是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编辑所人员。……”由此可见,瞿先生死于“文革”中的冤狱。

后的又一代表作，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据说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曾经影印过，本人未见到。90年代初，我曾与台北市文海出版社联系，他们寄来徐一士遗著的影印本，其中一部是顾麟趾所著的《山右谏狱记》和先父的《近代笔记过眼录》合订本，载于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6—937辑。1996年9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近代笔记过眼录》。

这部著作介绍评述了清末民初十一位近现代学者、名人所著的笔记，分别是：毓盈的《述德笔记》、卓从乾的《杏轩偶录》、曾肇焜的《瓜棚闲谈》、高照煦的《闲谈笔记》、陈庆淮的《谏书稀庵笔记》、江庸的《趋庭随笔》、徐华农的《南斋日记》、高廷瑶的《宦游纪略》、史念祖的《弢园随笔》、黄清宪的《半弓居省墓日记》、陈惟彦的《宦游偶记》。书中记载了清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真实情状。由于是评介专人的笔记，与过去根据时事变迁和手头掌握或特意收集资料去写某人某事不同，而是有针对性地挖掘选定目标，从当时已难寻的上述笔记中梳理出最有史料价值的珍贵资料，使其传诸后世，免于流失。笔记的内容大致有：中国现代警政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内幕，晚清教育制度和教官生涯的写实，学部留学生的考试，书吏的贪污腐败情况；慈禧太后深宫祷雨和一次内廷召对的细节，官府断案的谬误，史念祖、英果敏、僧格林沁的军事生涯；咸同年间江南战乱后的残破景

象,厘税制度建立后的腐败现象,以及科考中的大挑以貌取人、八股与策论并考的趣谈,官场失态的笑料,张之洞被欺购贗鼎,李鸿章未掌文衡为憾事,状元及第的殊荣,赛金花身陷囹圄纪事,谈八字、星象与算命,“刺字”残忍谈,颐和园掌故,等等。这些内容多是笔记作者的亲闻亲历,是不易觅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而且文笔生动流畅,读来赏心悦目。而徐一士在移录评述之时,经常加记与之相关资料,更增加了此书的价值。

《近代笔记过眼录》一书的整理,以台湾的影印本为依据,纠正其中的个别错讹;原书漫漶不清之处,因无其他校本,不便擅改,加缺围符号标识。原文中没有小标题,此次出版保存其原貌。整理中若有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2007年9月25日

徐泽昱识于京寓亦佳庐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目 录

整理说明	1
自序	1
述德笔记	2
杏轩偶录	14
瓜棚闲谈	19
闲谈笔记	36
谏书稀庵笔记	59
趋庭随笔	119
南斋日记	155
宦游纪略	172
弢园随笔	186
半弓居省墓日记	214
宦游偶记	226

自序

余喜观杂书，于笔记之类，颇事涉猎，惟无力，不能多致，尤乏珍秘之本耳。此类著述，大抵随意抒写，不为体裁所拘，而内容则自国家掌故、名人史迹、以逮社会习俗、乡曲琐闻，形形色色，樊然毕陈，或庄或谐，各具态致。虽事有信诬，文有工拙，而流览所及，时睹可取。兹就所见近代人撰笔记诸种，酌为介述，并摘录原文，间附考订，即谓之为《近代笔记过眼录》云。

述德笔记

《述德笔记》，四册，凡八卷，十丈愁城主人（毓盈，字损之，宗爵将军）撰，清末军机大臣贝勒毓朗之弟也。卷尾有毓朗所为跋，文云：“《述德笔记》，吾弟记实之作也。先考清德，赖以流传于世，伟矣。惟对于余多溢美之词。实余学浅，平日有不能自抑处，流露齿颊间，为所记取，有以启之，余之过也。读者视为敬爱之言，别白观之可也。辛酉孟夏余痴生跋。”（辛酉为民国十年。）此书卷一首列其父定慎郡王（溥煦）行述。以下暨各卷，均记毓朗事，于其品学政绩，称道不容口。就跋语观之，盖多出毓朗所授，颇具毓朗自传之性质也。

此书固似专为表彰毓朗而作，宣传文字之意味颇浓。然毓朗在清末历任要职，所记动关政史资料，治国闻者，所宜览观。如卷一中记及庚子义和团之乱，卷二中记毓朗受知肃王（善耆）之由来。（同以王子考应封，授镇国将军，亦如科举而称同年，一见相契，后得善耆汲引基于此。又卷一中记及考试时情形，亦此项考试之小史料。）记善耆为崇文门正监督引

佐税务。(轶事可供参考。崇文门差,向称弊藪,善耆任事时颇有所整顿也。)卷三录其自记赴日本考察警察土木事。(庚子乱后,善耆膺管理工巡局之任,接自日本人川岛浪速之手,盖巡警总厅之前身也。川岛倡派人赴日考察之议,善耆委毓朗偕川岛前往。此为日记之体,于此行记载颇详,归后即任工巡局总监。)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为北京创办警察时期之史料),记王维勤、李马氏两案。卷五记任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卿事。(于鸿胪寺,谓“冷署堂司,贪鄙形状,殊可笑,亦可怜”。于光禄寺,更实写其状。此类冷署穷官,其情形素不为人注意,读之如读《官场现形记》焉。)记官巡警部侍郎事(亦有关警史)。卷六记以贝勒偕梁敦彦赴厦门欢迎美舰事。(时革命党极活动,风声鹤唳,人有戒心。毓朗临行预嘱家中后事,后在闽有刺客被捕,往返情事,录毓朗自记。)卷七记官步军统领事,记与贝勒载涛同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及管理军谘府大臣事,记任军机大臣事,记出席资政院事,凡是多为有关系之记载,可供参稽。

毓朗于宣统间为军机大臣,时同列为庆王奕劻及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共四人。卷七所记有云:“每早召见军机,四人同上,少坐即退,复召回庆邸、那相,始议朝政。余兄及徐相固不得与闻。摄邸重违太后意,且避嫌也。日日如此,约四阅月。后于召见军机大臣毕,复召泽公伦贝子,时甚久,退而朝旨降矣。初,徐相同余兄之待庆邸、那相也,往往需一小

时,至此时,庆邸、那相之待命也,或过之,几日日如此。庆邸不悦,曰:‘今日又不得朝食矣。’久之,二公又嘱军机处不得登召见某某之事,庆邸愈不悦矣。”宣统二、三年间之枢廷史料也。奕劻、载泽之争权相轧,为亲贵间之内讧,其齟齬之状,于斯亦可略见。

又所记被命入军机时情事,谓:“余兄之入军机也,初无消息,一日忽召见,摄邸问:‘盛宣怀何如人也?’余兄对曰:‘有才能之人也。惟以某所知,伊曾司铁路、轮船、电报等重大事业,家殷富,然未闻有益国库之入,且各局率多泄沓少振作,余则未知也。’退,即闻盛某著回交通侍郎任之旨下矣。嗟乎,未一载川汉铁路事起,终以亡国,使盛公不坠尚书,或尚不至此也。谁实为之,谓之何哉。余兄不可谓非先见也,然怒之怨之者固大有人在也。无何,朝命下,余兄同徐公世昌入军机。次日入值,同人有异色。亭午,忽隆裕皇太后召摄邸,良久不下,庆邸与那相约略其词,相视而笑,既而军机章京报摄邸退而归府矣。庆邸问有何谕旨,云无之,惊谓那相曰:‘何以无之?’那相漫应之,旋曰:‘无事,可散矣。’遂散值。归后,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太后怒,召摄邸,欲收回成命。摄邸固持不可,乃已。”时载泽以辅国公任度支部尚书,为孝定后所倚信。盛与载泽相结,恃为奥援也。

毓朗为北京开办警察甚有关系之人物。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云:“方兄之东行也,肃邸委之充工巡局总监,而以

副监张柳代理之。张君久充幕僚，于公事熟悉，非卤莽灭裂之比。惟涉世久，习于揣摩，以官为家，未能免俗为憾耳。上之东还也，诸豪贵亦归，守旧之侑势复盛。而日人操京师警务之权，张君介乎两大之间，巧为趋避以应之。川岛之练巡警也，分三科，曰高等、中等、初等。初等卒业，即补巡警；高等、中等卒业者，即任为警巡巡长。执行职务时，有功过辄干涉之。张君苦之，乃以总监未归，凡警务学堂卒业送局请用者，以候总监归核办遣之，而别募厮隶走卒充巡警，嘱托逢迎，势所难免，警务为之一衰。兄归，乃说肃邸力行新法，凡非警务卒业者，均不得服制服，饷亦不得与卒业比。飭各局委员待卒业长警以礼，不得视同厮养，禁刑责。时各分局总办多陈人，协巡局之旧也。西北分局总办某，责巡警，且不以道。兄怒飭之，调巡警于总局，立奖之。某怒辞职。旋裁西北分局，归并西局焉。警巡之初设也，分八等，以慎重名器之故，无至六等者。有一掌全局警务者，当局以其兄为显宦也，擢充四等警巡，而彼时尚未受高等教育。至是兄不以为可，即日飭调往西南分局，且嘱遇选高等生时，送入警务学堂教之。惟学堂卒业候差之人，闻余兄之归也，群以任差之期相诘。兄乃往见川岛，与之约曰：‘君，君子也，以后学堂之权，君操之，以育警德，培警学，高其人格；地方行政之权，予操之，以一事权而便措施；消防队人，皆选自众中，人品学问较优，予与君共监督之。何如？’川岛曰：‘将军言诚是。然中国

官场多腐败，不重公务，奈何？兄笑曰：‘今日以前工巡局，他人事也，今日以后余任之，功罪皆所不辞。同行久，阁下岂尚视予等于余子耶？’川岛笑允之，警权遂分。乃谕局员曰：‘学堂初等科卒业者，均准照学堂所定等级著制服，未有相当缺可补时，皆以三等巡警授之。中等科之巡长，高等科之警巡，皆如之。’学堂与工巡局，遂无抵牾处。久之，不得意之徒，遂媒孽其间。一日，川岛有事相商，忽曰：‘与将军处久，颇相信，惟警权之交还，人谓仆为将军所给，何也？’兄笑曰：‘人言无足恤。君静思予给君否？’川岛思之良久，对曰：‘将军实未尝见给也。’一笑而罢。川岛名浪速，东邻君子也，初随联军到京，寓东城大市街三条胡同恩宅，秋毫无犯。一日，兵误毁一木凳。川岛乃召房主人，与之道歉，问索赔若干，罚其兵给之。时八国之兵分踞四城，扰攘无已，时闻侵占人所有物，无敢过而问者。今川岛待人如此，愈感之。恩姓与余家为姻娅，故知之稔。乔口勇马之在顺天府署理警政也，不通中国语，假手翻译绅士，多为所蔽。乔口去，乃易川岛，司北京警政。联军退，设协巡局，工巡分局之所由来也。绅士之中有瑞某者，平日交欢川岛，颇窃权威，及两宫欲回銮，大惧，乃约某某往见肃邸告密，力诬川岛有野心。肃邸大笑，谓兄曰：‘瑞某思以一身脱祸，负川岛矣。’后此公任总督，终以滑脱误天下，悲夫。（按：瑞某谓瑞澂也。）余兄之任警务也，于一切措施，多不循蹊径，一时豪强敛迹，有行行且止之畏。一切陋

规皆罢之。

……时当承平久，捕务懈弛，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荣，虽三令五申，信尝必罚，无效也。兄乃自访聚赌处，飭分局总办自往抄之，王公府第之设局者，一时敛迹。有溥十者，某贝子之子也，有设赌庇匪之事，弹劾之，囚于宗人府一年。有一宗室崇子后，广交游，独不畏法，设赌局，与西北分局对门相望。局中司法处委员刑曹司员文某，怙恶不悛，婪赃无度，总办畏之，转恃以鱼肉乡里，所以前日有因抄赌得罪之巡警也。兄怒，飭捕崇某，终无敢捕之者。索之急，崇某乃夤缘肃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邸，肃邸慷慨无畦町，遂得幸。一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之，旁人曰：‘无他，将军捕之急耳。’王大笑，谓之曰：‘将军捕汝，我亦无能为力，但不至由我府中捕去。若尔行街道中，须自小心也。’崇气沮，始闭赌局。文某终以墨败，遂撤局差。初，国家设八旗，分二十四固山，即兵籍之制，满蒙汉人皆入之。自庚申后，旗饷日减，生齿日繁，率皆贫窳。庚子之变，饷断者数月，幸川岛招练巡警，多应之，故内城巡警皆旗人，生计赖以少苏。外城仍五城御史之旧，相形见绌，后亦照内城设总局以理之。兄建议推广招募密云小五处驻防，救济无算，有劝肃邸添招客民以消畛域者，又有劝肃邸改用上海租界管理法者，兄笑曰：‘旗人满蒙汉皆具，且有回子、缅甸、高句丽、俄罗斯人，何谓畛域也？今旗人失饷，无以为生，徒要不分畛域之虚名另募，何如因利乘便之

为得计也。警务之学甚深，外人管理章程与其本国不同，简陋不足法也。’皆拒也。庚子之役，德国公使克林德死之。既和，要为克林德立石坊于就日坊北，外部任建筑役。承修之商人古玩铺掌柜人高尚仁善奔竞，一日，石工聚赌于通衢，禁之不止，乃大哄，巡警捕之，被殴伤，因并逮高。时已上灯，兄正由局将归，乃飭暂禁押所，忽有奉宸苑文书至，视之，乃索放高尚仁者。首书‘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銮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云云，后列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余衔。兄阅之，大怒曰：‘此宵小藉势庇匪之惯技，不惩无以安闾阎矣。’乃提高至，掷文书与看曰：‘殴警之事，是非曲直，明日讯尔，今杖汝为此文书也。’乃重杖之，置文书不覆。川岛之操警政也，一扫旧日步营诈索闾阎恶习，对待人民以平和手段为归。兄接管后，力守斯旨。时有故习复萌者，辄罪之，虽分局长官多旧日官僚，陋风终难尽革，然与昔日管地面者已有上下床之别矣。忽有建议归并外城者，兄拒之，曰：‘外城袭五城御史之旧，多南省京官，奴隶坊官，秽污街道，动以流言挟之，未可轻于合并也。内城极力整理，外城可暂听之，徐图着手，否则使我内城维新之萌芽夭折矣。’乃止。又有以上海租界章程献者，肃邸交局议，兄仍否认之，曰：‘洋商之于租界，非其治国法也，因陋就简，居留地之公约耳，何足效之？’后复有以招民人充巡警请者，余兄曰：‘庚子而后，八旗生计奇窘，巡警之额有限，除老病残疾外，尽以充

之，犹虞不给。旗人习于弓马，奔走是其专长，又有底饷，虽少足以资其养生，化无用为有用，因势利导，未可更张也。或日后扩充外城，再议未晚。’事遂寝。”工巡局时代之北京警察史料，罕见记载，此所记于毓朗或有溢美，而可供史家之要删。

又卷五记其任巡警部侍郎事云：“余兄之升任巡警部侍郎也，以吴越（按：“越”应作“樾”）炸五大臣于火车站，朝廷建设专部，使徐君世昌整理警政始也。工巡局自肃邸丁内艰卸事，那尚书桐继之。未几炸弹案出，改设巡警部，收外城归巡警部直辖。徐君世昌补尚书，余兄与赵君秉钧补左右侍郎。（按：赵氏先赏三品卿署理，后乃真除。）……徐君雄才大度，刚毅有为，内城事仍托之余兄，外城事则托之于赵君秉钧，以张元奇、钱能训、延鸿、吴廷燮等充丞参，规划天下警务，议设警官。余兄力持必作文官阶级，以议者欲以参游都守位置之，蹈步军统领衙门覆辙。兄曰：‘武弁久为社会所轻侮，参游都守，习于卑鄙齷齪，一旦以此名之，则数年之功堕矣。’执不可。乃设文官，议者又欲以六品为极，兄言于徐尚书，乃以四品为之长。退而语人曰：‘我非争巡警之官阶，为保持其人格也。我之任工巡局总监也，厚巡警之俸给，尊其身份，巡警有所关白，我未尝不正容接之，立而与语。委员有慢之者，斥之；巡警有自薄者，惩之。言出法随，从无反汗，一洗旧日徇情枉法之习，以故有所惩无敢为之词者。惟遇事一再审慎，